

從問題到研究：中國「三十年代文藝」 在臺灣（1966-1987）

張俐璇*

摘要

「問題與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刊物名稱，源於一九五〇年代「自由中國」針對「大陸問題」的「匪情研究」；本文藉「問題與研究」之名，指出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從作為「禁忌問題」到成為「討論研究」的轉變歷程。諸多成名於三十年代的作家，在1949年後因為「陷匪」或「附匪」的理由，名列在戒嚴時期臺灣多個版本的《查禁圖書目錄》中；但未及解嚴解禁，1966年即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重新獲得討論與研究的機會。本文分由國民黨文藝觀點、「純文學」以及「鄉土文學」三方面，討論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的接受與偏重現象。本文指出就國民黨觀點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討論，仍是延續著「共匪禍國」的批判，並藉由三十年代作家在「共產中國」被整肅的現象，重塑自身「自由中國」的定位；而相較於「純文學」觀點偏重右翼「自由」作家，「鄉土文學」論述則側重東北作家的左翼呈現。本文經由「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的三種表述，重新思索「中國現代文學」與「戰後臺灣文學」的網絡關係。

關鍵詞：三十年代文藝、中國現代文學、戰後臺灣文學、純文學、鄉土文學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From Issues to Studies: Chinese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aiwan (1966-1987)

Chang Li-Hsua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ssues & Studi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name of a journ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ts name can be traced back to “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 which were focused on “mainland issues”, conducted by “Free China” in the 1950s.

Through the name of “Issues & Studies”, the essay points out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aiwan—how it was viewed from “issues of interdiction” to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Many writers who became famous in the 1930s were listed i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Catalogue of Banned Books* in Taiwan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because of the accusation of “fallen into communism” or “defected to communism”. However, not until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regained the opportunity for discussion and stud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ook place in 1966.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acceptance and preference of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aiwa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of the Kuomintang(KMT), “Pure Literature”, and “Nativist Literature”. The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Kuomintang’s perspective on the discussion of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still maintained the critique of “communist atrocities”. In addition, it reshaped its “Free China” position through the fact that many 1930s writers were purg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ar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Pure Literature”, in which right-wing “liberal” writers were much more

highlighted, the discourse of “Nativist Literature” emphasized the Northeast writers’ left-wing 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three kinds discourse of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aiwan,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ost-war Taiwan Literature” is reconsidered.

Keywords: 1930s Literature and Art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ost-war Taiwan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Nativist Literature

從問題到研究：中國「三十年代文藝」 在臺灣（1966-1987）¹

張俐璇

一、從「民國熱」談「黃金時代」

根據 BBC 中文網的報導，中國媒體出現「民國熱」的說法，始自 2006 年。²不過但凡能成為風潮熱潮，必有其前置的長時間醞釀，因此若往前溯源，當可推回世紀之交，來自於兩岸市場與政治變動的影響。諸如 1999 年兩岸合資製作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徐志摩、張幼儀、林徽音與陸小曼，重新挑起兩岸對於「民國初年」的文化想像；諸如 2000 年臺灣總統大選，由民進黨執政，國民黨第一次成為在野黨，這個結果，讓「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對世紀冤家」³分由「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立場，找到「反對臺獨」以及「不分裂」的共同目標。在這樣的狀態下，中國媒體對於國民黨在臺灣的報導，日趨正面⁴，連帶的，對於國民黨過去所領導的「民國」，定位也從「萬惡的舊社會」翻身而為人才輩出、思想多元、「一

¹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灣文學場域中『民國文學』視野的變遷（1966-1987）」（MOST 106-2410-H-002-223）之部分成果；初稿題為〈「黃金時代」與「跳舞時代」——「三十年代文藝」在戒嚴臺灣的問題與研究〉，2017 年 12 月 15 日宣讀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圖學·文化交流：臺灣與東亞的多元對話國際學術論壇」。論文的修訂，感謝《成大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豐沛的思考訊息，特申謝忱。

² 秦川：〈透視中國：慶祝「雙十節」的大陸人〉，《BBC 中文》網站，2014 年 10 月 8 日，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4/10/141008_chinafocus_taiwan_roc（2018 年 4 月 14 日上網）。

³ 黃重豪等著：〈陸生的公民學分〉，《陸生元年》（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頁 260。

⁴ 相仿的是，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2009 年也有《旺報》創刊，是臺灣第一份大陸專業報，致力於「海峽兩岸了解」。2015 年再推出英文旺報 Want China Times。

一切都是自由的」⁵的「黃金時代」。⁶

如此這般對於「民國史」的重新評價，也促發了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重新思考，2006年，上海秦弓（張中良）進一步提出「民國史視角」（取代過去唯左翼獨尊的視角）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方法。⁷ 2010年，北京李怡更精確地提出「民國機制」（推動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闡釋框架」。⁸ 「民國文學」（1912-1949）的提出，在中國學界內部，是對「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的更新，不僅在時間上往前七年，在內容上也不再侷限於「現代」；而在外部，相較於臺灣的原住民文學，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民國文學的經典時期（1912-1949）」無疑是兩岸最能交集之處。「民國文學」的概念，職是被期待成為兩岸「走近彼此的精神橋樑」。⁹

「民國」作為兩岸共享的資產、共通的符碼，從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到傳記電影《黃金時代》，可見一斑。不過《黃金時代》中的蕭紅（1911-1942）及其同時代的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等「三十年代」的「東北作家」群，在臺灣顯然沒有《人間四月天》裡的徐志摩（1897-1931）來得「知名」。這裡可以思考的問題是，同樣是「民國」作家，造成「陌生」的理由何在？

七〇年代臺灣文學場域，透露了一些線索：

「三十年代」對生長在臺灣的這一代而言，是一個遙遠、陌生而又充滿了神

⁵ 《黃金時代》電影臺詞。崔舜華：〈如死的生活，方生的寂寞〉，收入蕭紅著：《生死場》（臺北：新雨出版社，2015），頁2。

⁶ 在許鞍華2014年的蕭紅傳記電影《黃金時代》之前，還有2007年李安的《色戒》；2011年1月，為慶祝「民國百年」，臺灣《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製作的「1949以前中華民國在大陸」專輯，原案轉載自2010年9月中國《新周刊》「民國範兒」專題。2016年成名於網路的中國作家林懷青在臺灣出版《活在民國也不錯》（臺北：野人文化出版社，2016）。

⁷ 秦弓：〈三論現代文學與民國史視角〉，收入李怡、羅維斯、李俊杰編：《民國文學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276。

⁸ 李怡：〈民國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闡釋框架〉，收入李怡、羅維斯、李俊杰編：《民國文學討論集》，頁247、248。

⁹ 李怡、張堂錡：〈發刊詞〉，《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一輯》（臺北：秀威經典，2015），頁8。不過，相較於在中國學界談論的「民國」，是1912-1949年；當臺灣學界提及「民國」，存在著兩種「起源」的想像：1912年與1945年。

秘與嚮往的年代。「人子」不止是舊夢重溫，同時也是人生體會。¹⁰

以《未央歌》（1959）成名的鹿橋（1919-2002），在1974年再推出長篇小說《人子》。小說在七〇年代臺灣的行銷宣傳，特別將「三十年代」標舉出來。這段宣傳文字，其實相當耐人尋味。首先，「生長在臺灣的『這一代』」指涉為何？其次，「三十年代」作為一個時間區段，應該是一個普世性的時間概念，何以對於「這一代」人，會是「遙遠、陌生」？第三，因為對於「三十年代」的「陌生」，因此顯得「神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遙遠、陌生」的時間區段，心「嚮往」之的理由，又何在？最後，「三十年代」在過去是「遙遠、陌生」的年代，為何在一九七〇年代忽然又成為一個可以言說、可以嚮往的年代？

緣此，本文試圖探問者有三：一是臺灣對於「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作家的偏重現象是如何形構的？二是「三十年代」一詞在戰後臺灣的文學場域，為何曾經如此曖昧？又是在怎樣的機制下，促成「三十年代」文學可以被言說討論？以及被如何討論？三是在這樣的討論過程裡，對於臺灣文學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藉此，本文重新思索中國現代文學與臺灣文學的網絡關係。

二、中國「三十年代」與左翼文藝發展

「三十年代」在七〇年代的臺灣，之所以會是「一個遙遠、陌生而又充滿了神秘與嚮往的年代」，主要在於它曾經是作為「問題」的存在。因為「三十年代」所隱含的「左翼」特殊性，在戒嚴時期臺灣是個禁忌的問題。也因此，在進入「三十年代文藝」在戰後臺灣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於中國「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發展，先行梳理。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立基左翼觀點的「三十年代文藝」，指涉的則是

¹⁰ 這段文字出自1974年遠景版《人子》書底扉頁宣傳文字，這段文宣一直維持到1996年第26版。2007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版本改為「這本書是寫給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小孩子和大孩子們看的故事。」

1927-1937 年的十年。¹¹ 1927 年的中國，最重大的兩件歷史事件是北伐和清黨，北伐之後，中華民國在南京的政府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而清黨運動則導致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分裂。據此，1927 年成為「兩個民國」的分界，甚至是第一階段的「民國之死」。¹² 1927 年國民黨的清黨行動，促使國共分裂，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從城市轉向農村，由罷工轉成游擊，以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革命為運動核心。¹³ 1927 年職是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轉折關鍵，在《劍橋中國文學史》書寫中，也將 1927 年定位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過渡：1927 年國民黨的清黨行動，使得五四文學革命話語體系中「附著的政治意味更為增強」。¹⁴

國民黨政府清黨之後，左翼作家以上海租界地為庇護，在 1930 年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是由創造社、太陽社等作家，及魯迅、茅盾、丁玲、郁達夫等人聯合建立的組織，目標在建立無產階級的文藝。次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併東三省的 1931 年，瞿秋白（1899-1935）從俄國返回上海，成為「左翼作家聯盟」文藝政策的實際負責人。1932 年，瞿秋白依據蘇聯公謨學院¹⁵刊物《文學遺產》上的論文，在《現代》雜誌上編譯評介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特別加註「現實主義：Realism」，並且進一步將馬恩的現實主義，區分為「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兩種。¹⁶影響所及就是今日對於 Realism 的中譯：「寫實主義」看似有較為「中性」的想像；而「現實主義」更為強調箇中的實踐介入力量。

左聯在文藝上的施力，讓「30 年代經濟題材小說大量呈現出反帝和革命的主

¹¹ 例如馬良春、張大明編：《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選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¹² 余杰：〈自序：天下已逝，邦國難成〉，《1927：民國之死》（臺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出版，2017），頁 11-15。

¹³ 〔法〕畢仰高（Lucien Bianco）著，何啟仁譯：〈第三章 初試啼聲的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起源 1915-1949》（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頁 74。

¹⁴ 王德威：〈第六章 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國文學〉，收入〔美〕柯馬丁（Kern Martin）等著，王國軍等譯，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 年之後》（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頁 474。

¹⁵ 英文 Com-munism 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學院。

¹⁶ 王福湘：〈第五章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輸入〉，《悲壯的歷程：中國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 130-131。

題」¹⁷，諸如 1933 年，茅盾（1896-1981）出版長篇小說《子夜》，是工商業破產小說的代表之作。其後，有「30 年代文學洛神」之稱的蕭紅，在 1935 年發表成名作《生死場》；冰心出版短篇小說集《冬兒姑娘》。還有因為瞿秋白影響而加入共產黨的田漢（1898-1968），在 1935 這一年，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後來成為國歌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同年，巴金等人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魯迅去世，曹禺（1910-1996）的戲劇《雷雨》、《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出身北京下層社會的老舍（1899-1966）在《宇宙風》雜誌發表長篇小說《駱駝祥子》。三十年代的作家們先後藉由長篇小說形式，表達對於整體社會問題的看法。¹⁸也是在 1936 這一年，為了另行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宣布解散，年底西安事變後，國共再次合作，1937 年後，進入「全面」抗戰。

職是之故，立基在左翼觀點的「三十年代文藝」，可以說是由 1927 年國共分裂開始，至 1937 年國共合作為終。其中，「左聯」的文藝運動，扮演著相當的角色。即便如此，三十年代的思潮，實際上是國父的「三民主義」、馬列的「共產主義」、歐美的「自由主義」三足鼎立的狀態¹⁹；並且，當時的左翼文學雖然標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但因為「左聯」的左翼思想是在城市文化圈中進行的，因此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作品，仍是大宗。在這樣的情形下，因而有 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長篇講話，定下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影響深遠。1966 年 5 月，當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通知〉，公開譴責共產黨內「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同年 7 月，中國《紅旗》雜誌第 9 期，重刊毛澤東在 1942 年的這篇「講話」，將之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¹⁷ 鄔冬梅：〈第四章 民國經濟危機與 30 年代經濟題材小說〉，收入李怡、張中良主編：《民國政治經濟形態與文學》（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頁 103。

¹⁸ 蘇敏逸：〈第一章 緒論〉，《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頁 3-12。該書指出國共分裂後的局勢變動，成為促發「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形成的重要歷史事件，討論文本包含葉聖陶《倪煥之》、茅盾《虹》、老舍《駱駝祥子》、巴金《激流》三部曲、端木蕻良《科爾沁其草原》、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等長篇小說。

¹⁹ 李牧（李超宗）：〈第一章 三十年代的文藝形成與演變〉，《三十年代文藝論》（臺北：黎明文化，1973），頁 9。

命的指南」，整肅以周揚（1907-1989）為代表的「三十年代資產階級文藝路線」。²⁰換句話說，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場域，「三十年代文藝」不是那麼「根正苗紅」，它代表的是 1942 年「工農兵方向」以前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於是，文藝界作為受到「徹底批判」的五個專業之一²¹，沈從文等多位成名於三十年代的作家，都成為思想上需要「再教育」的對象。²²

三、國民黨觀點的「三十年代文藝」

從以上簡略的耙梳，可見「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身影在「三十年代」的活躍景況。不過，面對 1949 年，這個「民國文學、歷史、思想的交會與分流」²³的關鍵時刻，茅盾、田漢、老舍、沈從文、冰心等作家，無一跟著中華民國到臺灣。就國民黨政府來說，1949 年是「共匪禍國」，而前揭作家多數成名於三十年代，國民黨因之歸咎於「在這個年代裏，中共運用了文藝，逃過它危亡的命運，而且改寫了歷史」。²⁴

其實就「三十年代」的時間範疇，就有國共觀點的兩種版本，以尹雪曼在《中華民國文藝史》中的界定為例，所謂「三十年代文藝」指稱的是「自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九年的十年」，在國民黨的民國史觀裡，「左聯」的成立，是文壇十年混亂的開始。因此所謂的「三十年代文藝」，實際上便是「左傾作家造反的文藝」。²⁵國民黨

²⁰ 李牧：〈第九章 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清算〉，《三十年代文藝論》，頁 259、280。

²¹ 受到「徹底批判」的五個專業，分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和出版界。奚密：〈第七章 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收入〔美〕柯馬丁等著，王國軍等譯，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 年之後》，頁 581。

²² 在文革時期受到文藝整風的，包含張天翼、吳組緝、趙樹理、謝冰心、周作人、朱光潛、何其芳、茅盾、巴金、沈從文、楊沫、老舍、田漢、曹禺、馮雪峰等多位作家。詳見「歷次『文藝整風』遭受清算、批鬥、整肅之文藝工作者及作家名單」，李牧：〈第九章 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清算〉，《三十年代文藝論》，頁 276-279。

²³ 黃月銀整理記錄：〈【圓桌座談】1949：民國文學、歷史、思想的交會與分流〉，收入李怡、張堂鈞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三輯》（臺北：秀威經典，2016），頁 292。

²⁴ 姜穆：〈左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三十年代作家論》（臺北：東大圖書，1986），頁 2。

²⁵ 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第十二章 文藝運動〉，《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

觀點的「三十年代」因此也就包含 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後，國共兩黨合作的時期。這是國共兩黨對「三十年代」時間範疇的最大歧異：就共產黨來說，1937 年合作抗戰之後，是以「民族主義」為前提；而國民黨則認為，在這個時期裡「中共利用抗日戰爭之名和合法的地位」²⁶，爭取群眾，而有後來的群眾基礎。「三十年代文藝」儼然成為國民黨敗亡恥辱的緣由。在五 0 年代臺灣的抗戰／反共小說，也不乏這樣的解釋：

政府一向不擅做宣傳工作，共產黨卻是靠宣傳起家，因此政府供應了大量的大米、白麵、制服，卻抵不過共諜利用的左傾文人們寫出的一些小說、散文、詩歌、活報劇。²⁷

職是之故，痛定思痛，1952 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成立「第四組」，編發黨內機密刊物《宣傳週報》²⁸，專司理論宣傳與文化控制，包含圖書查禁工作。前揭那些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中國」作家們，在「自由中國」這一方，便被列名在第四組所頒發的「匪及附匪分子作者名單」之中。在 1954 年的「文化清潔運動」裡，三十年代作家因為留在紅色中國，其作品成為「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同為需要被掃除的「三害」。²⁹ 1958 年，「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和臺灣省政府聯合，針對違反戒嚴法與出版法的圖書，多次編印出版《查禁圖書目錄》³⁰，老舍、曹禺著作，乃至文化生活出版社譯書，屢屢名列其中。也因此，在作為「反共復興基地」的寶島臺灣，對於「三十年代」現代文學發展的認識，大抵是左翼魅影幢幢，又因屢被查禁，「因而不敢親近，不敢言談」。³¹而這些也就是「三十年代」作為「問題」的理由。

如果依照今日の後見之明，很容易認為中國「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的解禁，是

頁 936。

²⁶ 丁望：〈前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頁 5。

²⁷ 王藍：《藍與黑》（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 491。

²⁸ 自 1952 年 8 月 1 日創刊，1960 年 9 月停刊，發行 8 年，共 16 卷 438 期。

²⁹ 〈推行文化清潔運動 文教界聯名簽署 厲行除三害宣言〉，《聯合報》第 3 版，1954 年 8 月 9 日。

³⁰ 依據 1964 年版《查禁圖書目錄》，計有五種查禁理由：「匪首、匪幹之著作及翻譯之圖書」、「附匪分子之著作及翻譯之圖書」、「匪偽書店出版之圖書」、「為匪俄宣傳之圖書」、「翻印匪偽之圖書」。

³¹ 李牧：〈第一章 三十年代文藝形成與演變〉，《三十年代文藝論》，頁 5。

在 1987 年臺灣解嚴之後。但正如同 1942 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張道藩立刻有長文〈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³²的回應；1966 年，當「三十年代」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整風，「自由中國」立刻重探「三十年代文藝」。換句話說，當「三十年代」作家在彼岸的「共產中國」受到清算、文壇地位陡降；在此岸的「自由中國」則從「禁忌問題」成為「研究討論」的對象。

以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為例，「中央副刊」在 1966 年便相當「即時」地出現「三十年代文藝」的系列討論文章，更在同年結集為《三十年代文藝論叢》出版。就主編孫如陵的觀點，「三十年代」的重要性，首先在於「是大陸上那些投匪的文人藝人，大多數在這段時期成名，或開始嶄露頭角」的時代；其次，成就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的歷史條件，乃因「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文藝予以充分的創作自由」；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為文革的清算整風，讓眾人醒悟「三十年代無異黃金時代」，因而心生懷念，而懷念「三十年代」，「就是懷念國民政府，就是懷念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挑選在 1966 年雙十國慶出版的《三十年代文藝論叢》，更是「為反攻復國提供了必成的保證」。³³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的臺灣，介紹中國三十年代文學，不無強化「自由中國」在寶島臺灣的文藝政策正當性之意。

在此立論點上，由 38 篇論述結集的《三十年代文藝論叢》，字裡行間延續的是五〇年代以來反共與反攻的血淚激情，即便是林語堂（1895-1976），作為幽默散文大師，撰有〈我看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將「大陸整肅文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視為「共產黨的猴子戲」，並基於復興基地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預言「共匪將在三年之內敗亡」。³⁴也有梁實秋（1903-1987）延續戰前他在《新月》上所批評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普羅文學運動」，實際執行的是俄國的文藝政策；再次強調所謂的「普羅文學運動」是「利用文學做武器的一種政治運動」，只是「想在文學領

³² 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張道藩先生文集》（臺北：九歌出版社，1999），頁 597-627；本篇原載於《文化先鋒》第 1 卷第 1 期，1942 年 9 月 1 日。

³³ 孫如陵：〈序〉，《三十年代文藝論叢》（臺北：中央日報社，1966），頁 1、2。

³⁴ 林語堂：〈我看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共匪將在三年之內敗亡〉，收入孫如陵編：《三十年代文藝論叢》，頁 79、80。

域爭取領導位置的運動」³⁵，還是在反共與否共的脈絡裡。其他還有如玄默〈共匪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唐柱國〈匪報的副刊〉等，無論是對於「三十年代文藝」，抑或是對成名於三十年代的作家在 1949 年後際遇，都是批判大於介紹。

1966 年《三十年代文藝論叢》結集出版之後，1967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當前文藝政策」，成立教育部文化局³⁶，黨的文藝政策正式被納入國家行政體制之中；1968 年，國民黨進一步召開「文藝會談」，在會議中指出「回顧歷史，匪黨創始人雖早於『五四』時期即已插足文藝領域，但匪黨纂編『五四』文藝果實，使之應用於政治宣傳，其收穫之大，則在『三十年代』。」在會議紀錄中，甚至不否認「共匪就是靠三十年代文藝起家的」。³⁷國民黨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關注，也延續到九年後的第二次文藝會談。1977 年 4 月，臺灣鄉土文學論戰開始；7 月，彼岸鄧小平復出，重掌政權；同年 8 月，在此地彼岸的社會波動下，國民黨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三十年代文藝」再次成為被提案討論的對象。出於「共匪今日謀我」，「必從階級意識上作為開端」，為免「被共匪利用」，因此尹雪曼等人「建議大會轉請黨政有關主管單位，對三十年代的部分文學作品、作家詳加研究」。³⁸這樣的提案，多有「以正視聽」的努力。

其實在 1977 年第二次文藝會談之前、1975 年《中華民國文藝史》出版之後，軍方色彩濃厚的黎明文化公司在推出的《中國新文學叢刊》中，已出現不少「三十年代」作家作品。³⁹「中國新文學叢刊」是一套上百本的作家自選集，第一本書是《梁實秋自選集》。作家編「自選集」其實是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國的一個文學經驗，

³⁵ 梁實秋：〈所謂「普羅文學運動」〉，收入孫如陵編：《三十年代文藝論叢》，頁 96、94、97。

³⁶ 黃翔瑜：〈教育部文化局之設置及其裁撤（1967-1973）〉，《臺灣文獻》61：4（2010.12），頁 267。該文有一點睛之處在於指出「教育部文化局」的設立，雖與「文復運動」有關，不過早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前，國民政府已著手籌設文化單位。

³⁷ 田原記錄：〈第二次會議紀錄之附件一：大陸文藝情況報告〉，收入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文藝會談實錄》（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968），頁 43、44。

³⁸ 尹雪曼等五十六人提案：〈會談一般提案暨臨時動議〉，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第二次文藝會談實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7），頁 33。

³⁹ 關於國民黨中央主導的三次文藝會談（1968、1977、1981），以及軍方系統黎明版「中國新文學叢刊」等訊息，非常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提醒。

諸如 1933 年，上海天馬書店就出版了魯迅、周作人、茅盾、郁達夫的自選集。⁴⁰不過，黎明文化在 1975-1981 年間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叢刊》，在作家「自選集」之外，還間雜著幾本「選集」，諸如《徐志摩選集》、《朱自清選集》、《夏丏尊選集》、《許地山選集》、《郁達夫選集》等。有意思的是，這些「三十年代作家」，都是在 1949 年前已過世的作家。換句話說，是沒有「陷匪」或「附匪」問題的安全名單。1978-1980 年間，在第二次文藝會談之後，又陸續有丁望《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孫陵《我熟識的三十年代作家》、陳紀滢《三十年代作家記》等系列「史書」問世。從作家選集到評介論述，可以說是國民黨「為了爭奪 1930 年代文學詮釋權」的生產。⁴¹在這個脈絡下，「三十年代文藝」雖然在臺灣「重現」，但很少在「文學」上著墨，多半圍繞在作家與政治的糾葛，特別是文革期間受到清算的作家，往往成為被「大書特書」的重點。⁴²國民黨立場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研究，比較還是置放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研究共匪禍國史中、研究中國文藝史中」⁴³的「匪情」研究脈絡。較早進入三十年代「文學」介紹的，可以《純文學》月刊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觀察對象。

四、「純文學」觀點的「三十年代文藝」

「三十年代」作家作品具體樣貌的體現，林海音（1918-2001）主編的《純文學》月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的「舊文新刊」。《純文學》月刊是林海音在 1967 年 1 月創辦的文學雜誌，創刊號有〈做自己事 出

⁴⁰ 陳子善：〈梁實秋和他的自選集〉，《每日頭條》網站，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e962b9y.html>（2017 年 1 月 7 日上網）。

⁴¹ 王力堅：〈「民國文學」抑或「現代文學」？——評析當前兩岸學界的觀點交鋒〉，《二十一世紀》150（2015.8），頁 43。

⁴² 張堂錡：〈「禁區」與「誤區」：臺灣的「三十年代作家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1：2（2014.3），頁 25。

⁴³ 任卓宣：〈任序〉，收入李牧著：《三十年代文藝論》，頁 1。

一臂力〉作為「代發刊詞」，該文援引《辭海》指出，「近世所謂文學（literature）有廣狹二義：廣義泛指一切思想之表現，而以文字記敘之者」，而「純文學」則取其狹義，「專指想像及感情的藝術的作品」。⁴⁴對比廣義的「一切思想之表現」與狹義的「想像及感情的藝術的」，可見編者之用心，因為「一切思想」太過廣泛，在戒嚴時期臺灣，可能涉及諸多「政治不正確」的禁忌問題，特別是甫在 1963 年因為「船長事件」離開《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一職的林海音，因此錨釘在「想像及感情的藝術的」這樣的「美學概念」。換句話說，「純文學」一詞出現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文學場域，實是白色恐怖政治下的產物。

《純文學》月刊第二期開始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也需要置放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來看。例如為何有這樣專欄的設置，林海音表示「是為了彌補現代讀者對近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脫節現象」；然而絲毫未提的，在戒嚴時期也絲毫不能提的，是造成如此「脫節現象」的理由：出於對「附匪」、「陷匪」作家的圖書查禁政策，以「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二條為例，「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之出版社物一律查禁」，老舍、魯迅、沈從文、夏丏尊等作家，皆名列《查禁圖書目錄》之上。⁴⁵ 1967 年開設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實是「在兩岸文化灰色地帶」的操作⁴⁶：延續著 1966 年《中央日報》中央副刊對於「三十年代文藝」討論的脈絡，這些在戒嚴臺灣被查禁的作家作品，因為彼岸共產中國文革的發生，轉而成為可以討論研究的對象。

不同的是，如果說《中央日報》是植基於右翼反共意識形態立場，對於三十年代「作家」的批判；那麼在《純文學》這裡，主編林海音代表的是戰後臺灣「自由人文主義」流脈的特殊位置⁴⁷，關注的是三十年代「作品」的呈現。專欄名之為「近

⁴⁴ 本社：〈做自己事 出一臂力〉，《純文學》1（1967.1），頁 2。

⁴⁵ 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收入封德屏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發展現象》（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頁 198-202。

⁴⁶ 蘇偉貞：〈彌補與脫節：臺、港《純文學》比較——以「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主〉，《成大中文學報》60（2018.3），頁 41。

⁴⁷ 王鈺婷：〈五四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以臺、港《純文學》「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討論範圍〉，《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3（2018.6），頁 127。

代」，指稱的是 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⁴⁸，大抵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命名的本身，就是「純文學」的一種藝術：避開了曖昧難明、國共左右意識混沌的「三十年代」指涉。從專欄的規劃來看，相較於《中央日報》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批判討論，《純文學》確實單「純」了不少，得以有對於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的概貌認識。

例如我們看見了老舍。《純文學》月刊在「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選刊了老舍的中篇小說〈月牙兒〉。小說記述女孩「我」從七歲喪父來到二十幾歲入獄的故事。「爸死時那個月牙，媽轎子前面那個月牙，我永遠忘不了。那一點點光，那一點寒氣，老在我心中，比什麼都亮，都清涼」。父親過世、母親改嫁，然後「新爸忽然走了」，生活貧困難以為繼，母親當過洗衣婦，最後淪為暗娼。敘事者「我」固然「在小學裏念了幾年書」，但在醜陋現實之前，深覺「學校裏教給我的本事與道德都是笑話，都是吃飽了沒事時的玩藝」。「我」戀愛過、工作過，最後發現「婦女的命運不在自己手裏」、「世界是狼吞虎嚥的世界，誰壞誰就佔便宜」，女兒「我」最後「世襲」了母親的職業，然而暗娼不是正式的妓女，因為沒有納捐，最後「我」因而被捕入獄。⁴⁹

〈月牙兒〉最初發表在 1935 年 4 月的《國聞周報》⁵⁰，係脫胎自 1932 年發表於《小說月報》的長篇小說《大明湖》。也是貧窮人家出身的老舍，寫的是一對貧窮母女的悲慘際遇：母親迫於生活，做了暗娼，後來跳了大明湖，女兒接著走母親的路。⁵¹小說可謂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對於「墮落的婦女」，給予了相當的理解，與深情的尊重。這些是〈月牙兒〉很重要的書寫背景與意識特色，但在「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的評介中，卻付之闕如。甚至，〈月牙兒〉的編刊本身就是相當「曲

⁴⁸ 《純文學》月刊從第 2 期到第 25 期（1967 年 2 月至 1969 年 1 月）的「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重刊沈從文〈邊城〉、老舍〈月牙兒〉、盧隱〈海濱故人〉等舊文，計有許地山、郁達夫、凌淑華、盧隱、戴望舒、沈從文、周作人、老舍、魯彥、朱自清、夏丏尊、宋春舫、俞平伯、羅淑、朱湘、孫福熙、孫伏園、徐志摩等作家作品。

⁴⁹ 老舍：〈月牙兒〉，收入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278、279、287、289。

⁵⁰ 原載《國聞周報》第 12 卷第 12 至 14 期（1935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老舍：〈月牙兒〉，《月牙兒·陽光·我這一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 28。

⁵¹ 范亦豪：〈「月牙兒」解讀〉，收入老舍：《月牙兒與陽光》（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頁 66。

折的縫綴」⁵²：小說〈月牙兒〉與「菱子」的評介文章〈談老舍及其文體〉是穿插刊出的，換句話說，老舍的〈月牙兒〉是被包裹在菱子的〈談老舍及其文體〉之中；1980年結集為《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出版時，老舍小說與評論才被分開列出⁵³，並且「菱子」也回到真名林海音。

目前論者較少關注到的是《純文學》新刊老舍舊文〈月牙兒〉的完整性。無論是1967年的月刊版，抑或是1980年的結集成冊版，老舍的〈月牙兒〉實際上短少了頭尾兩段：

是的，我又看見月牙兒了，帶著點寒氣的一鉤兒淺金。多少次了，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牙兒；多少次了，它帶著種種不同的感情，種種不同的景物，當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中的碧雲上斜掛著。它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⁵⁴

獄裡是個好地方，它使人堅信人類的沒有起色；在我做夢的時候都見不到這樣醜惡的玩藝。自從我一進來，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經驗中，世界比這兒並強不了許多。我不願死，假若從這兒出去而能有個較好的地方；事實上既不這樣，死在哪兒不一樣呢。在這裡，在這裡，我又看見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兒！多久沒見着它了！媽媽幹什麼呢？我想起來一切。⁵⁵

這裡可能的解釋是，第一段之所以被捨棄，在於當初菱子〈談老舍及其文體〉穿插小說的文字流暢性考量；而第四十三段，也就是最後一段，則可能是過於「灰色」，諸如「獄裡是個好地方」、「自從我一進來，我就不再想出去」因為「世界比這兒並強不了許多」。從「憎惡自己所處的具體的地獄」到「看透並宣布整個世界就是個大地獄」⁵⁶，這樣赤裸的宣示，不如讓小說結束在因為暗娼沒有納捐，所以「我換了個地方，到了獄中。」⁵⁷來得擁有秩序、穩定的力量。

⁵² 此處借用李京珮語。詳細參考資料同下註。

⁵³ 李京珮：〈曲折的縫綴：《純文學》對五四作家的接受〉，收入封德屏編：《臺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頁93。

⁵⁴ 老舍：〈月牙兒〉，《月牙兒與陽光》，頁8。

⁵⁵ 老舍：〈月牙兒〉，《月牙兒與陽光》，頁64。

⁵⁶ 范亦豪：〈「月牙兒」解讀〉，收入老舍：《月牙兒與陽光》，頁73。

⁵⁷ 老舍：〈月牙兒〉，收入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頁293。

《純文學》月刊「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在介紹老舍的這期，負責評介導讀的作家是梁實秋與林海音。兩者評介的面向也是值得留意的。林海音向梁實秋邀稿時，曾有這樣一段過程：

記得當時我……曾問梁實秋先生，他說：「如果老舍真的死了，我可以寫他。」梁先生所以有此允諾，因為那時中國大陸上正鬧文化大革命，作家、藝術家、音樂家被紅衛兵弄傷弄死的不知有多少；馬思聰逃出來了，老舍自殺了，都是那時聽到的。而且馬思聰逃出來以後，也證實了老舍的死。⁵⁸

後來，老舍已死，梁實秋交稿〈憶老舍〉一文，文章篇幅不長，有大半是與老舍在重慶北碚說相聲的回憶，文末附上老舍的另一篇短文〈春來憶廣州〉，寫的是因為天候差異緣故，在北京養花之不易。在梁實秋筆下的老舍，與寫〈月牙兒〉的老舍，可說是形象南轅北轍，從底層人民的關懷，來到養花蒔草的中產階級趣味。

即便是林海音自身，以筆名「菱子」的評介，雖然介紹有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也指出人力車夫「駱駝祥子」是「北方勞苦大眾的典型形象」，但最後則強調人力車夫的悲劇「不單是勞苦民眾的悲劇，而是中國社會民族的悲劇」，將小說從「階級」轉向「民族」的觀照；而針對〈月牙兒〉，突出的則是「春蛙唱著戀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氣裏……」⁵⁹這樣的語言文體，藉此討論小說描繪女孩「我」在初次戀愛時候的所見所感的書寫策略問題，將小說對底層關懷，轉向至書寫文體的討論。

職是之故，以《純文學》月刊「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例，從「純文學」觀點出發重探「三十年代文藝」，主流文化參與者固然「為文學表達爭取到相對自主的空間」，但同時「也配合着當局的文化政策方針」⁶⁰，「三十年代文藝」因此被納入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文字語言的「純文學」討論。

影響所及是 1976 年成立的洪範書店，所推出的「二、三十年代名家作品」選。

⁵⁸ 林海音：〈一點說明〉，《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頁 2。

⁵⁹ 林海音：〈談老舍及其文體〉，《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頁 302。

⁶⁰ 張誦聖著，劉俊、馮雪峰等譯：〈第三章 軟性威權統治和主流位置〉，《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頁 92。

在痲弦（1932-）規劃下，洪範書店在臺灣解嚴之前，出版不少三〇年代作家作品，包含朱湘、戴望舒、劉半農、郁達夫、梁遇春、宗白華、豐子愷、周作人、許地山、凌叔華、徐志摩、沈從文等人之作，林淇瀆（向陽）曾指出此為「戒嚴時期最有規模引介中國三〇年代文學的壯舉」。⁶¹如果將痲弦策劃出版的這批三十年代作家名單，對比林海音在《純文學》「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所評介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會發現有相當的重疊性：都是在戒嚴臺灣「安全無害」的作家作品。何謂「安全無害」？這裡可說有兩類，一是在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許地山，「保險係數大」⁶²；二是在共產中國「政治運動中的整肅對象」，老舍是這一類的代表性作家。

五、臺灣「鄉土文學」與中國「三十年代文藝」

促成「海內外自由人士」討論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理由，除開1966年起，中國文革的影響，臺灣在七〇年代的外交變動，也是重要的因素。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開始要面對「如何以新的說辭來詮釋反共價值觀的問題」⁶³，因而進一步將「反共」學術化。可以說，因為國際外交情勢的變化，在臺灣研究中國的問題意識，開始「從一種敵我情感的鬥爭情境，發展成不戰不和的共存局面」⁶⁴，出於對「中共政權不是必亡」的承認，因此要進一步了解中國大陸各方面的「持續與變遷」，將之視為「將繼續面臨」的挑戰。⁶⁵

職是之故，1972年，以「匪情研究」為創社宗旨的「大陸問題研究社」在臺大成立，是為國民黨文化勢力在大學校園建立的青年幹部組織；1973年在臺灣4所大

⁶¹ 向陽：〈為文學出版樹立典模：洪範書店成立40周年的意義〉，《文訊》370（2016.8），頁68-71。

⁶² 古遠清：〈林海音：作為「自由派」的作家〉，《幾度飄零：大陸赴臺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95。

⁶³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11（2000.9），頁81。

⁶⁴ 石之瑜：〈第三章 問題意識〉，《大陸問題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89。

⁶⁵ 吳安家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1）。

學開設「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概論」的課程。七〇年代初期，「共和國」尚未改革開放，「民國」為團結海外僑民，借用海外華人的學術人力資源，也自 1972 年起，邀請僑居國外的學人，利用暑假回臺期間，召開「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討會」（簡稱「國建會」），在一週的會期裡，分組討論政治、外交、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開啟海外學人為國建言的機制。⁶⁶

出於和「海外」的連結，1973 年初，胡耀恆在《中外文學》發表〈開放三十年代文學〉一文，指出「去年以來，毛共開始在海外積極展開統戰工作，不僅手法與三十年代如出一轍，甚至又重複利用了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而「今天在海外的學人和留學生，大部分都是從國內出去的」，國內對三十年代文學「禁而未絕」的現象，只會「造成三十年代文學的神祕性，產生某種程度感情上的誤寄與認同」⁶⁷，植基於此，建議公開三十年代文學。1974 年，美國軍官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完成博士論文《蕭紅評傳》，促發夏志清注意到先前在《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專論中錯過的、同是出身中國東北的作家端木蕻良（1912-1996）。易言之，七〇年代初期，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美國漢學界，受到相當程度的關注。

海外學人對於「中國三十年代文藝」的關注，在戒嚴臺灣的文學場域，影響所及是「鄉土文學」一詞的提出。小說家王禎和（1940-1990）曾經說道「『鄉土』這兩個字最先是在美國的一個中國留學生說出來的。」⁶⁸ 2015 年，在臺灣政治大學所舉辦的「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上，劉大任（1939-）親口表示他正是這位「中國留學生」。彼時在美留學的劉大任，仍協助「文季」系列刊物的推廣，因此持續與尉天驄、陳映真通信，期間正讀到端木蕻良（1912-1996）等作家作品，因此在通信中，建議在戒嚴臺灣的文學場域，以「鄉土文學」取代具有高度社會意識的「現實主義」作品。⁶⁹

⁶⁶ 曹哲生：〈華府國建會新世紀的輝煌成長〉，《華府國建聯誼會》網站，網址：<http://www.capadc.org/Pages/CAPAHistory.aspx>（2018 年 4 月 14 日上網）。

⁶⁷ 胡耀恆：〈開放三十年代文學〉，《中外文學》1：11（1973.4），頁 6。

⁶⁸ 胡為美：〈在鄉土上掘根：遠景版五版代序〉，收入王禎和：《嫁妝一牛車》（臺北：洪範書店，1993），頁 283。

⁶⁹ 張俐璇：〈從「寫實」到「現實」：論《文學季刊》、《文季》與臺灣文學思潮的「左」轉〉，收入國

為什麼是端木蕻良？從他的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可以管窺到其間的聯繫關係。原名曹漢文的端木蕻良，出身東北大地主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離開家鄉，1932年加入北方「左聯」，1933年受到魯迅的鼓勵，開筆寫作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1939年出版。《科爾沁旗草原》以大地主丁家為中心，既是「家族史」也是東北的「地方誌」。⁷⁰端木蕻良在1940年的〈科爾沁前史〉裡，對於「東北」的地域特殊性，有一番相當馬列主義的分析。科爾沁是蒙古族的部落名，科爾沁旗草原囊括的是「關東草原所有最好的田地」，是十足的農業社會，東北地主家庭，也「就像一個小的墾殖公司似的」，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內部存在著複雜的社會階級問題。而在外部，則有1900年沙皇的俄軍佔領東三省，以及1904年的日俄戰爭。進入民國以後，因為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東北草原的生產物品「完全商品化」，亦即「食糧和農村的聯繫淡薄了，反而和都市相依為命起來」⁷¹，再經由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與連結到世界市場。開始倚賴外國市場的結果是，當世界經濟恐慌之際，原有的階級內憂，加上民族外患，導致東北農村崩潰。

以端木蕻良為代表的三十年代東北作家，其特殊性便在於，因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的離鄉，使得漂泊在外的東北作家在「鄉土文學敘述中加入了一種國家危急的緊迫感」。⁷²也因此，何以在海外的劉大任，會建議尉天驄、陳映真等人採用「鄉土文學」一詞來描繪六〇年代以降書寫臺灣的作品？正在於端木蕻良的小說所體現的「農村」與「階級」的問題。一九六、七〇年代的臺灣，也面臨農村邁向工商業社會的轉型，以及美、日帝國主義的問題，然而在戒嚴時期的臺灣，因為反共的意識形態主導下，那是「不能說的農村（因為主導文化的農村顯影是多麼健康寫實，

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〇年代》（臺北：政治大學圖書館，2016），頁195。

⁷⁰ 蘇敏逸：〈第五章 個人、家庭與社會的複雜角力：「家族史」長篇小說〉，《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頁286。

⁷¹ 端木蕻良：〈科爾沁前史：開蒙記〉，《端木蕻良文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頁528、565。

⁷² 王德威：〈第六章 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國文學〉，收入〔美〕柯馬丁等著，王國軍等譯，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頁490。

不容置疑)、不能說的階級」⁷³，於是，「鄉土文學」一詞成為最佳的偽裝。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王拓要撰文〈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意圖撥開「鄉土文學」的迷霧，凸顯農村與階級的「現實」。因為從東北作家而來的「鄉土文學」，通常是被歸類在「民族鄉土」情懷下的。例如 1979 年，鄉土文學論戰方歇之際，葛浩文在臺灣的《中國時報》發表〈關外的鄉土文學〉，特別引述了魯迅如何評價蕭軍（1907-1988）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着中國的一部分，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⁷⁴有意思的是，這一年，葛浩文也同時發表了〈黃春明的鄉土小說〉，固然知道三十年代東北作家與六、七十年代臺灣作家的關懷不同，但仍認為「鄉土文學」是兩者皆宜的指稱，並且將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和蕭紅《呼蘭河傳》中的祖孫關係聯繫起來。⁷⁵

換句話說，將「中國三十年代文藝」，連結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從海外留學生劉大任，到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對「鄉土文學」此一辭彙的應用，將「左翼」連結上「中國」（民族主義），大抵開啟了日後的「左統」（左翼統一，左翼立場必然支持中國統一）敘述。⁷⁶也因此不難理解的是，即便因為文化大革命，三十年代作家在共產中國受到整風，因此在自由中國獲得重新討論；但如同魯迅、端木蕻良等「本格」左翼作家，依然不會在討論之列。

1978 年底，「共和國」改革開放，「民國」與美國斷交，1979 年「中」美建交，

⁷³ 張俐璇：〈第五章 現實主義及其不滿〉，《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6），頁 324。

⁷⁴ 葛浩文：〈關外的鄉土文學〉，《葛浩文文集：論中國文學》（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頁 36。原刊於臺灣《中國時報》，1979 年 9 月 4 日。

⁷⁵ 葛浩文：〈黃春明的鄉土文學〉，《葛浩文文集：論中國文學》，頁 47。該文最初發表於 1979 年 2 月在美國德州奧斯汀市舉辦的「臺灣小說討論會」。後收錄於 Jeanette L. Faurot 主編，印第安納大學發行之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以及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之《漫談中國新文學》。

⁷⁶ 關於「左翼+統一」的形構，是臺灣文學未來有待研究的課題之一。七〇年代的「左統」論述，亦見於陳若曦出版於《尹縣長》之後的長篇小說《歸》：「事物是在不斷地變化呀！自從中共進聯合國，尼克森訪華，『臺獨』早已銳氣大減，如今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啦！魏明很早就作一百八十度的左轉，現在是臺灣人裡面的大左派了！」陳若曦：〈第二章 武漢〉，《歸》（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頁 129。

又再促發了另一波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討論。以《文壇》月刊社為例，發行人朱嘯秋（1923-2014）因應海峽兩岸的政治變動，發函給諸多文友，提問道：

- 一、我國三十年代文藝作品應否局部開放？它的利弊如何？
- 二、對中共黨員作家，與陷進鐵幕的作家，我們應如何對待他們？
- 三、對三十年來被中共侮辱、迫害的作家，應怎樣支援慰問？
- 四、對當前大陸上的反共文藝作品，應如何作研究整理工作？

針對第一個問題，時任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的尹雪曼（1918-2008）指出，市面上、書店裡，是有「三十年代文藝作品」的，諸如徐志摩、郁達夫、戴望舒、朱湘、夏丏尊、胡適之、劉半農、許地山……。尹雪曼據此認為「今天主張、要求、贊成『開放』三十年代文藝作品的若干人」，實際上對於「三十年代文藝作品」是指魯迅、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作品」。⁷⁷

1980年，海外學人在國建會文化組提出：「建議政府適度的開放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及學術著作。每一個時代都具有其代表性的著作，不宜中斷。三十年代的作家並非完全左傾，其作品也並非都含有共產毒素。宜邀請有關專家學者，組成委員會，加以分析，選擇並寫序言，逐步開放為宜。」⁷⁸臺灣的文學場域關於「三十年代文藝」的討論，再一次躍上檯面。如果在1966年係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緣故，那麼在七、八〇年代之交，則是因為臺灣內部的「鄉土文學」問題：

問題是「回歸」什麼樣的「鄉土」？廣義的「鄉土」民族觀抑或偏狹的「鄉土」地域觀？如果走的是後面這條路，我們要問那跟三十年代的註定失敗的普羅文學又有什麼兩樣？⁷⁹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銀正雄（1952-）、董保中（1933-）皆曾以中國「三十年代文藝」論爭為之比擬。當時自美國回到臺灣擔任臺大外文系客座教授的董保中指出，三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不是新月派的冷靜說理的文章，而是最能以感情煽動，

⁷⁷ 尹雪曼：〈三十年代文藝作品與左翼作家作品〉，《文學思潮》6（1980.1），頁27-29。

⁷⁸ 趙滋蕃：〈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文學思潮》8（1980.10），頁93。

⁷⁹ 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收入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頁203；該文原載於《仙人掌雜誌》第2期（1977.4），頁131-140。

最擅長人身攻擊謾罵的左派文人的手筆。」而鄉土文學作為「當前臺灣的文藝論爭」正流於類左派的情緒化，無助於「理性的發展」。⁸⁰

1979年周錦編選《中國的怒吼》，收錄創作41篇，係選自1931-1939年間的報紙副刊及文學雜誌；該書強調「這裡所搜集的，乃是真正的三十年代文學」。⁸¹藉由「抗戰時期文學」的編纂，將「真正的三十年代文學」指向「愛國的聲音」。於是，雖然來到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仍舊還有關於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只是至此的「研究」意義又是另外一層：因為「我們並沒有從血跡斑斑的來路上獲得經驗與教訓。因而有鄉土文學論戰，至演變成以後一連串事件，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⁸²「三十年代文藝」至此，又再度成為左翼禍國的負面指涉。

六、結語：從「問題」到「研究」

「問題與研究」是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刊物名稱⁸³，源於一九五〇年代「自由中國」針對「大陸問題」的「匪情研究」；本文藉「問題與研究」之名，指出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從作為「禁忌問題」到成為「討論研究」的轉變歷程。諸多成名於三十年代的作家，在1949年後，因為「陷匪」或「附匪」的理由，名列在戒嚴時期臺灣多個版本的《查禁圖書目錄》當中；然而在解嚴之前，1966年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重新獲得討論與研究的機會。

本文分由國民黨文藝觀點、「純文學」以及「鄉土文學」三方面，觀察中國「三

⁸⁰ 董保中：〈我們當前的一些文藝問題〉，《文學·政治·自由》（臺北：爾雅，1978），頁176、177。董保中在評論裡，提及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強調「只把鄉土文學改名為寫實主義是不夠的」，重要的應當回歸「超越階級的民族主義情感」。除卻摘引王拓的原篇名出現「現實主義」之外，董保中的行文皆以「寫實主義」論之，仍意圖避免三十年代以來「現實主義」所具有的左翼意識形態。

⁸¹ 周錦：〈中國的苦難、怒吼、奮鬥、勝利〉選輯前言，收入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臺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頁222。

⁸² 姜穆：〈左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三十年代作家論》，頁2。

⁸³ 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自1996年開始發行之《問題與研究》季刊（TSSCI）。

十年代文藝」在臺灣的接受與偏重現象。本文指出，就國民黨觀點而言，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討論，仍是延續著「共匪禍國」的批判，並藉由三十年代作家被整肅的現象，重塑自身「自由中國」的定位；而就「純文學」的觀點，以《純文學》月刊「近代中國作家作品」專欄對於老舍小說的選刊與評介為例，則是藉由批評論述，轉向人道主義與語言文體的「純文學」關懷；相反地，如果說「純文學」對於「三十年代文藝」的接受，是較為右翼、自由主義的，那麼在「鄉土文學」這裡，則是更為左翼特色的凸顯，並與六、七〇年代臺灣的鄉土文學書寫現象聯繫起來。易言之，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乃至1987年臺灣解嚴前，中國「三十年代文藝」在臺灣，存在三種表述，攸關左右翼的對立，也攸關戰後臺灣「純文學」的形構、「鄉土文學」的想像。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王禎和：《嫁妝一牛車》，臺北：洪範書店，1993。

王藍：《藍與黑》，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老舍：《月牙兒與陽光》，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

老舍：《月牙兒·陽光·我這一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馬良春、張大明編：《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選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張道藩：《張道藩先生文集》，臺北：九歌出版社，1999。

陳若曦：《歸》，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

*鹿橋：《人子》，臺北：遠景出版社，1974。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蕭紅：《生死場》，臺北：新雨出版社，2015。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丁望：《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

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文藝會談實錄》，臺北：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96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第二次文藝會談實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7。

中華民國文藝史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

王福湘：《悲壯的歷程：中國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臺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石之瑜：《大陸問題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95。

余杰：《1927：民國之死》，臺北：八旗文化／遠足文化出版，2017。

吳安家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991。

李怡、張中良主編：《民國政治經濟形態與文學》，廣東：花城出版社，2014。

李怡、張堂錡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一輯》，臺北：秀威經典，2015。

李怡、張堂錡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三輯》，臺北：秀威經典，2016。

* 李怡、羅維斯、李俊杰編：《民國文學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臺北：黎明文化，1973。

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臺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

* 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

林懷青：《活在民國也不錯》，臺北：野人文化出版社，2016。

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論》，臺北：東大圖書，1986。

封德屏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發展現象》，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

封德屏編：《臺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2007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8。

* 孫如陵編：《三十年代文藝論叢》，臺北：中央日報社，1966。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〇年代》，臺北：政治大學圖書館，2016。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

*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6。

張誦聖著，劉俊、馮雪峰等譯：《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

黃重豪等著：《陸生元年》，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論中國文學》，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

董保中：《文學·政治·自由》，臺北：爾雅，1978。

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法〕畢仰高（Lucien Bianco）著，何啟仁譯：《中國革命的起源 1915-1949》，臺

北：聯經出版社，2017。

〔美〕柯馬丁(Kern Martin)等著，王國軍等譯，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

(二) 期刊論文

尹雪曼：〈三十年代文藝作品與左翼作家作品〉，《文學思潮》6(1980.1)，頁 27-31。

* 王力堅：〈「民國文學」抑或「現代文學」？——評析當前兩岸學界的觀點交鋒〉，《二十一世紀》150(2015.8)，頁 35-46。

* 王鈺婷：〈五四女性文學傳統之傳承與轉化——以臺、港《純文學》「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討論範圍〉，《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3(2018.6)，頁 120-145。

本社：〈做自己事 出一臂力〉，《純文學》1(1967.1)，頁 1-2。

林淇養(向陽)：〈為文學出版樹立典模：洪範書店成立 40 周年的意義〉，《文訊》370(2016.8)，頁 68-71。

胡耀恆：〈開放三十年代文學〉，《中外文學》1:11(1973.4)，頁 4-7。

* 張堂錡：〈「禁區」與「誤區」：臺灣的「三十年代作家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1:2(2014.3)，頁 23-30。

黃翔瑜：〈教育部文化局之設置及其裁撤(1967-1973)〉，《臺灣文獻》61:4(2010.12)，頁 259-298。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11(2000.9)，頁 71-105。

趙滋蕃：〈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文學思潮》8(1980.10)，頁 93-110。

* 蘇偉貞：〈彌補與脫節：臺、港《純文學》比較——以「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為主〉，《成大中文學報》60(2018.3)，頁 31-64。

(三) 報紙、電子資源

〈推行文化清潔運動 文教界聯名簽署 厲行除三害宣言〉，《聯合報》第 3 版，1954 年 8 月 9 日。

秦川：〈透視中國：慶祝「雙十節」的大陸人〉，《BBC 中文》網站，2014 年 10

月 8 日，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4/10/141008_chinafocus_taiwan_roc（2018 年 4 月 14 日上網）。

曹哲生：〈華府國建會新世紀的輝煌成長〉，《華府國建聯誼會》網站，網址：<http://www.capadc.org/Pages/CAPAHistory.aspx>（2018 年 4 月 14 日上網）。

陳子善：〈梁實秋和他的自選集〉，《每日頭條》網站，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e962b9y.html>（2017 年 1 月 7 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Li Hsuan, *Jian Gou Yu Liu Bian: "Xie Shi Zhu Yi" Yu Tai Wan Xiao Shui Sheng Chan* [Becoming Realism: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Fiction]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6).
- Chang Tang Chi, "'Jin Qu' Yu 'Wu Ou': Tai Wan De 'San Shi Nian Dai Zuo Jia Lun'" [The Forbidden and Misunderstanding Zones: A Critical Review of 1930s Chinese Writers in Taiwan] in *Xi Bei Shi Da Xiao Bao (She Hui Ke Xiao Bao)*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51.2 (Mar. 2014), pp. 23-30.
-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Di Er Ci Wen Yi Hui Tan Shi Lu* [Minutes of Second Literature Meeting]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1977).
- Li Yi, Luo Wei Si, Li Chun Jie ed., *Min Guo Wen Xiao Tao Lun Ji* [Proceedings of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 Lin Hai Yin, *Zhong Guo Jin Dai Zuo Jia Yu Zuo Pi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Works] (Taipei: Belles-Lettr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Lu Qiao, *Ren Zi* [Son of Man] (Taipei: Vista Publishing, 1974).
- Su Wei Chen, "Mi Bu Yu Tuo Jie: Tai, Gang *Chun Wen Xiao Bi Jiao*—yi 'Jin Dai Zhong Guo Zuo Jia Yu Zuo Pin' Zhuan Lan Wei Zhu"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Versions of *Pure Literature*: Reading the Special Colum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Works"] in *Cheng Da Zhong Wen Xiao Bao*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Vol. 60 (Mar. 2018), pp. 31-64.
- Sun Ru Ling, *San Shi Nian Dai Wen Yi Lun Cong*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1930s Literary] (Taipei: Central Daily News, 1966).
- Wang Li Jian, "'Min Guo Wen Xiao' Yi Huo 'Xian Dai Wen Xue'? —Ping Xi Dang Qian Liang An Xiao Jie De Guan Dian Jiao Feng" ["Republican Literature" versu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Controversies in the Cross-Strait Academic Circles] in *Er Shi Yi Shi Ji*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Vol. 150

(Aug. 2015), pp. 35-46.

Wang Yu Ting, “Wu Si Nu Xing Wen Xiao Chuan Tong Zhi Chuan Cheng Yu Zhuan Hua— yi Tai Gang *Chun Wen Xue* ‘Jin Dai Zhong Guo Zuo Jia Yu Zuo Pin’ Zhuan Lan Wei Tao Lun Fan Wei” [Inheritance and Modification of May Fourth Women’s Writing: Discussion on the Special Colum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and Works”] adopted in *Min Guo Wen Xiao Yu Wen Hua Yan Jiu Ji Kan* [Journal of Republ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3 (Jun. 2018), pp. 120-145.

